

蒋介石传

上

1887—1937

严如平 著
郑则民



中华书局



蒋介石传^上 1887—1937

严如平 著
郑则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传 / 严如平, 郑则民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7

ISBN 978 - 7 - 101- 09135 - 9

I .蒋… II .①严… ②郑… III .蒋介石(1887 ~ 1975)-
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3)第 014294 号

-
- | | |
|------|---|
| 书 名 | 蒋介石传(全二册) |
| 著 者 | 严如平 郑则民 |
| 责任编辑 | 欧阳红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53¼ 插页 4 字数 780 千字 |
| 印 数 | 1-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09135 - 9 |
| 定 价 | 88.00 元 |
-

序

张海鹏

几个月前，郑则民、严如平两位同志把他们合作撰著的《蒋介石传》打字稿放到我的书桌上，厚厚一大摞。书稿共分二十四章，七十多万字，是长篇巨制。两位在二十年前合著《蒋介石传稿》，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后，颇得好评。二十年来海峡两岸新刊布的史料甚多，两位合作者深感有吸纳新史料，修改旧看法的必要。乃于近数年投入三四年时间，修订旧稿，成就新稿。旧稿四十多万字，新稿七十多万字，不仅增加章节，而且全书结构焕然一新。这就不是一般的修订，其实就是重新写作。严如平同志出生于1932年，今年满八十岁，郑则民同志出生于1936年，也已七十六岁。在我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期间，郑则民同志担任过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革命史研究室主任。两位都比我年长，且已退休多年。在耄耋之年，继续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孜孜矻矻，在学术上求真、求新、求深，实在令人感动。两位嘱我作序，情甚殷殷。我个人对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缺乏深入地学术研究，他们以我曾担任研究所所长，且以往对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无了解相责。我不能辞。

蒋介石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从1924年受孙中山之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25年起，

投入东征、北伐，著有战绩，成为晋升之阶。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二十二年，是民国时期在国家负责岗位上时间最长的领导人。1949年后，长期主持台湾政务，直到1975年去世。

对于蒋介石其人的评价，在他生前或者身后，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各异，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亦有之。在今天，不仅在中国大陆，就是在中国台湾，也是众说纷纭。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初那种政治的逐渐淡化、冷却，随着各种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上的研究，逐渐走向客观。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

郑、严两位合著的《蒋介石传》，较之二十年前他们两位的《蒋介石传稿》，不仅大量采用新公布的档案史料，也尽力参考藏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在追求历史的真相、表述历史的本质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肯定。

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评价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应该注意什么呢？我在这里冒昧提出浅见如下。

第一，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以北伐扫除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谋求中国的统一，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任何党派和个人适应了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符合历史潮流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是从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出发，还是从党派的利益出发，凡是从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出发，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前途的党派和个人，就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第三，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赢得了抗战胜利，是组织各党联合政府，走和平民主建国的路，还是坚持走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路？只有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党派和个人，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第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美国干预下形成海峡两岸暂时分离的局面，是坚持一个中国，坚持中国统一的方向，还是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走台湾分裂的路，这也是评价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原则。

先说第一点。国民党一大确定国共合作实现国民革命，决定以北伐手

段扫荡北洋军阀的混乱局面，完成国家的统一，显然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蒋介石在这个阶段里，东征、北伐是有功的，1925—1926年在国共合作方面表现还是积极的，但是1927年4月发动清党运动，破坏国共合作，使国民党一大确定的以国共合作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半途夭折，这又是违背历史前进方向的。在这个阶段里，蒋的历史作用是有功有过，功过参半；如果站在扫荡北洋军阀的角度说，他是功大于过；如果站在国共合作的角度说，他是过大于功。全面衡量，如果按照国民党一大方针，以国共合作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统一，对于国家的前途可能更好，应该说过略大于功。

再说第二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造成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个时候，衡量中国的政治党派和政治人物，主要看他的言行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还是从一党一派的利益出发。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主张不抵抗，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剿共”，罔顾国民要求抗日的呼声，这就不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不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虽然面对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对抗日也有所考虑和准备，但其政策的趋向还是对日妥协。日寇越过长城线，华北危机，北平学生发出“华北虽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呼声。在全国抗日民意高涨的情况下，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发动西安事变，才最终推动蒋介石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使蒋介石下决心抵抗日本侵略。

下决心抵抗日本侵略，是一个正确的政治态度和决策，不仅符合当时的全国民意，也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是符合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蒋介石虽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本方针变成抗日第一、反共第二，不愿意放手发动全国人民，不愿意放手依靠中共抗日力量，但毕竟在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抗战，始终打出的是抗战的旗帜，与汪精卫投降集团有着本质的区别。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抗战是大方向。坚持了这个大方向，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就是正面的了。

再次，说到第三点。抗战最后赢得胜利，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赢得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个胜利，是全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战略配合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胜利。这

个胜利是中国复兴的枢纽。战争期间,日本的侵略和战争掠夺,对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战后,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是全国人民的愿望。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晤,国共两党达成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宪草协议,提出了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的民主制宪原则,开辟了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新路,得到有关各方和社会舆论的高度评价。政协会议达成的民主化进程的路线图,符合当时国人在战后和平建国、防止内战再起的愿望,却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愿意与各党派尤其是中共分享国家建设的重任,要通过战争继续维持国民党的一党利益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这时候,他把抗战时期的抗日第一、反共第二,转变成为反共第一、和平第二。蒋介石迷信武力,以为在很短时间就可以让中共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决然发动内战,却事与愿违,竟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遭遇到了国民党历史上最严重的惨败,失去了在中国大陆的执政权,躲到东南一隅的海岛,坐上了“南明”小朝廷的交椅。蒋介石、国民党的失败,当然有众多原因,违反民意是最基本的原因。战后不过四年,蒋介石从巅峰跌到谷底,说明了它的历史地位降到空前低落的程度。他是民国历史上因违反民意遭到大失败的又一例证。

最后,第四点。在台湾,蒋介石反对美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反对“台独”,坚持了“中华民国”立场,也就是坚持了“一个中国”的立场;他虽然反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不能不依靠美国,在台湾建设“反攻大陆的复兴基地”,使得台海两岸的分裂局面延续下来。他在台湾是反“台独”和反共并列第一。蒋介石反攻大陆无望,蒋氏父子却在台湾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新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蒋在这一点上是有贡献的。

除了上述四点外,还有一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领导权问题,需要单独提出来说一说。这个问题与对蒋介石的评价直接相关。所谓领导权问题,也就是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谁领导的问题。至今为止,它还是两岸中国人、两岸学术界各执一词、众说纷纭的问题。

200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的一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9月3日,在人民大

会堂,我聆听了胡锦涛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后又读了报纸发表的文字。胡锦涛主席在报告中说:“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段话,是许多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面阐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分别承担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战略任务。这是客观的历史评价,不仅政治影响极好,也具有学术上的指导意义。2005年10月,我在台北与台湾学术界的朋友们交流,也拜访过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发现那里的朋友们对胡锦涛的上述评价是满意的。我以为,学术研究可以在这个评价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中存在着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就比较完美了。

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老问题。我们过去习惯上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台湾学术界只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作用。对抗战历史中的这个认识问题,至今还影响着海峡两岸的人们。在抗战胜利近七十年的今天,我们可以冷静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企图灭亡中国。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危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各阶级、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在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这是对抗战的基本定性。从民族战争的全局来看,中华民族内部各党派、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只有团结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才有出路。说共产党发挥了领导作用,是因为它倡导、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大局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领导、指挥八路军、新四军(这不是一支乌合之众,而是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抗日为宗旨,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到抗战末期已接近百万之众),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从这一点来说,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当然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抗日战争中,还存在着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当时国家权力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是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际国内承认的统一政权,它指挥数百万军队,担负着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抗日战争只有发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可能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战。没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单凭共产党的力量,尽管他的抗日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全国抗战大局的。抗战期间,蒋介石虽然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八年抗战,尽管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无消极、片面的作为,对日有过妥协退让,但毕竟没有对日投降,毕竟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下坚持了抗战,最终把抗日的旗帜扛下来了。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党推动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是提高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还是贬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历史地位呢?很明显,蒋介石成为抗战领袖,与共产党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抗战把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是由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决定的。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扶持下,蒋介石、国民党一意孤行,肆意反共反人民,才从原有的历史地位上跌落了下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从实事求是的观点看,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看,蒋介石在抗战中尽管没有放弃反共,但还是把八年抗战坚持到底了。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同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是这场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基本条件,全民族抗战是否能实现,或者一时实现了,能否坚持下去而不中途夭折,以及中国是否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就要打一个大问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力量,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所以,人民力量的存在和发展这个基本条件的极大重要性,更加应该得到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因此,抗日战争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奋斗争取得来的。毛泽东在1938年也说过国共“共同领导”抗战的话。

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它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能够起作用的方面不一样,不是一个从属一个,又都是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这两个领导中心,不是一时一刻起作用的,都是全面的、全局的。不承认一个中心,或

者取消一个中心,行不行呢?显然是不行的。取消国民党、蒋政权这个中心,失去国家政权的力量,全国抗战难以推动,难以调动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敌作战,难以争取国际援助;取消共产党这个中心也不行,取消这个中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形成不了,还是内战不止,如何形成全国抗战的局面?取消这个中心,敌后战场谁来开辟,谁来领导,广大敌后地区的人民群众谁来组织和发动?取消这个中心,被敌后战场吸引的侵华日军的超过半数,将压在正面战场,国家还能够坚持抗战八年吗?

如果不承认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只承认共产党这个中心,抗战时期中国打的许多败仗,尤其是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谁来负责?共产党能够负责吗?全国政治的不民主、官吏的腐败堕落、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崩溃,共产党能负责吗?共产党当然不能负责,而应该由国民党的领导错误负责。

抗战后期,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的国际联系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美国、英国等发生国际关系,谈判废除《辛丑条约》和治外法权,蒋介石作为中国首脑出席开罗会议,同盟国一致同意并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回东北和台湾等地,以及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这些成绩离开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也是不行的。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必须尊重。

客观地说,在抗日战争这个整体大局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领导作用。这个作用,都是全局性的,不是局部的、暂时的。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中心所发挥的领导作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中心,并没有削弱、更没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中心的全局性作用。反之,承认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客观反映了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事实,对国民党的领导中心地位也没有削弱。双方这种都是全局性的领导作用,是各自通过自己的领导能力来实现的,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来实现的,是客观存在的。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又统一、又斗争的过程中,国共力量的消长发生着变化,总的历史趋势,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并且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换一句话说,国民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大变小,共产党这个领导中心的作用由小变大,这是对抗战中国国民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最终的说明,也是为什么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垮得那么快,

人民共和国能够迅速建立,近代中国历史开辟了新的通道的原因。

像任何一个曾经推动或者延缓历史进程的历史大人物一样,蒋介石一生不是风平浪静的,他的历史作用高低、曲折是有变化的。他有时候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有时又拉了历史前进的后腿。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地完全否定,简单地完全肯定,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郑则民、严如平两位同志的《蒋介石传》,正是以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家的独立强大这个基本视角,来研究蒋介石这个历史人物的。他们对在近代中国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蒋介石的历史作用,依据大量史料,钩沉索隐,反复斟酌,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我相信,这本著作,对学术界,对大众,了解、认识蒋介石其人的言行真相,是有帮助的,是有价值的。

我在本书付梓前先读为快,并且得出了一点读书心得,谨供作者、读者批评、参考。

2012年1月11日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前 言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动荡,大变革。在这动荡和变革的历史长卷中,蒋介石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群对他褒贬不一,说他是“人民公敌”、“历史罪人”者有之,说他是“民族英雄”、“一代伟人”者亦有之。尤其是在激荡的政治风云中,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对他的功过是非往往有着殊为差异乃至截然不同的记叙和评价,使人难以认识他的庐山真面目。客观、准确地记叙他的历史,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作出符合历史真实的公允评价,探求他的人生道路对历史的启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人们认识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十年前,我们在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进程中,得到李新同志的直接指导,对蒋介石的生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几经努力,撰著了一本四十多万字的《蒋介石传稿》由中华书局出版。虽然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认可,还获得了奖项,但当时许多档案资料尚未公开,我们的学识也受限制,以致制约了对某些史事的深入研究,影响了对蒋介石一生的准确认识。

二十多年来,随着海内外诸多档案的公开,尤其是蒋介石几十年日记手稿的开放,以及海峡两岸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广泛开展,对蒋介石的研究逐步深入;也随着自己学识的积累,使我们对蒋介石的认识不断加深。我们两人

2 / 蒋介石传

乃在有生之年再次携手合作,运用这些年研读的有关史料及自己学识上的些许收获,奋力写出这本新版《蒋介石传》,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求教于广大读者和方家。

在这本《蒋介石传》里,我们愿与读者一道,对大量史料进行辨析,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国际国内的诸多矛盾和冲突,钩稽抉微,探究历史的真实;并以国家独立、民族统一、社会发展、人民安康与否,作为评论功过是非的标准,历史地辩证地考察蒋介石的言行,钩玄提要,理智、客观、全面地审视他八十八年的一生,探求他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不囿于成见和防止偏见。对于史料的辨析和撷取,无疑是检验我们的史德和史识的试金石。我们努力避免先入为主,片面选取那种符合成见和定论的史料,同时防止轻信那些不甚准确的史料,不被某些史料(包括《蒋介石日记》)中言与行相背离的表面文章和文过饰非、自我辩解的言词所蒙蔽。在引证时严加选择,精心撷取能够表述史事真实的片段,以免模糊或颠倒事实真相。我们上述的努力达到什么程度,有待于广大读者和方家的审定和指正。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蒋介石传》,连同附录共约七十万字,对于蒋介石复杂的一生来说,还是只能择其军政生涯的大事为重点来作简明扼要的记述。全书以二十四章(计一百四十五节)分为以下几个时段来记述:

一、青少年时期,即本书第一章,时间是从1887年至1906年。关于蒋门家世,在相当一个时期里,曾经传说纷纭。蒋介石在修订宗谱时,把其祖辈追溯到东汉函亭侯蒋澄。社会上则曾流传着另外一些传闻逸事,甚至否定他有蒋氏血统。我们经过查考有关史料并实地调查访问,认真鉴别,对无据可证的说法和传闻不加采用,对一些证据不足的资料也慎重处理。依据确凿可信的资料,比较系统地记叙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一个盐商之家,童年生活优裕,养成顽皮、好胜的性格;早年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父母的身世都是清楚的。他入私塾、进学堂,十年寒窗,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华文化典籍,颇受孔孟思想和伦理道德的熏陶。在列强入侵、清廷腐败以及家境受欺的时候,血气方刚的他萌发了学军救国的愿望。

二、投身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即本书第二、第三章,时间从1906年至1922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激流影响下,蒋介石东渡日本留学,追随陈其美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运动。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勇敢投身于光复浙江之役;继而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南北军阀毁弃共和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斗争。当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后,他应召从家乡去粤海,登永丰舰护卫孙中山,与叛军相持四十多天,由此博得孙中山的信赖和器重。本书对蒋投身民主革命上述一系列活动,作了如实的记叙并予以应有的评价。他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也暴露出某些弱点和过错。例如他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杀害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曾鼓吹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格格不入的俾斯麦铁血主义;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缺乏坚定的信念。他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民主革命家。至于他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情况,我们充分运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档案和蒋介石日记等资料,厘清了他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前前后后,纠正了过去不甚准确的记述,并认为据以得出“投机家”、“冒险家”的论断是不恰当的。

三、建军黄埔与出征北伐,包括本书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章,时间从1923年至1927年。当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时刻,蒋介石受命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出访苏俄,以期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本书第四章运用了苏联解体后刊布的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以及荷兰收藏的档案史料,结合蒋介石的日记,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蒋介石及其代表团访苏的经过,尤其是蒋未能说服苏方支持《西北军事计划》的前前后后;也钩稽抉微,厘清了蒋后来形成对苏俄一些正反面认识的缘由,接近了历史的真实。蒋回国后受命担任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为建立革命军队,培养训练了大批骨干力量;进而形成了黄埔系,成为他后来稳居国民党首领的支柱。

第五章记述了蒋介石拥护和贯彻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方针,在平定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和平息滇桂军首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中,率领黄埔军校师生英勇战斗,为保卫南方政权、统一和巩固广东这一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逐渐成为南方政权的军事首领人物。孙中山逝世后,

蒋介石在苏联顾问的支持下,经过处理廖仲恺被害案、第二次东征、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逐渐掌控了南方政权的党政军大权,跃居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高位。本章在记述这一段历史事实的同时,还着重剖析了蒋介石在当时政治风云急剧变幻中迅速崛起的主客观原因。

第六、第七章记述了蒋介石率师出征北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蒋介石秉承孙中山的遗愿,在南方根据地已经稳固而北方军阀势力互相争斗不休且将南侵的形势下,于1926年初倡议北伐。他力排众议,制定作战方案,指挥十万国民革命军,向号称拥有百万大军的北洋军阀发起征讨。正义之师得到工农民众的踊跃支持,在两湖和长江流域节节胜利,大革命的风暴由南向北席卷神州大地,貌似强大、得到列强支持的北洋军阀统治迅速崩溃。北伐战争终结了十余年各种军阀势力割据、争斗、战乱不止的分裂混乱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使得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疑惧急剧增加,在外国列强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反共清党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北伐战争一时受到夭折。本书对于以上史事作了扼要记述,并对蒋介石力倡北伐,倾力指挥这场战争,联合各派力量,合力取得摧毁北洋军阀统治的完全胜利,给予应有的评价,指出北伐战争的胜利,结束了民国成立后十几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对于实现国家统一和推进社会发展,维护共和政体,遏制列强侵略,以至后来能够全国一致团结抗日,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四、在南京的十年统治,即1928年至1937年,是本书记叙的重点,用了六章的篇幅,即本书第八至十三章。第八章记叙了蒋介石及以其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北伐战争后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以孙中山设计的“训政”为政纲,“以党治国”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一心加强中央集权,编遣全国军队,以期维护国家统一和开展经济建设。编遣军队之举,固然是减少财政开支、维护社会安定之举,但与李宗仁桂系、冯玉祥西北军、阎锡山晋军以及唐生智等地方实力派力图保存和扩大各自的军队和权益直接发生了利益冲突,于是各种名目的内战硝烟在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不断升起。蒋介石

石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先后征服了各个军事集团，勉强维持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他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并追剿长征的红军。本书第九、第十两章对上述史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叙，指出他力图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之举，悖逆历史发展方向，必然埋下失败的种子。

第十一章对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内政方面，择要作了一些记叙。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方面，虽然也作了一些努力，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比起北洋军阀时期来自然有些增长；但是战乱的纷扰和政策的谬误，使得这十年的经济建设难如人意，尤其是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农村，封建土地关系未有丝毫改变，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纲领被束之高阁。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被少数权贵掌控，加上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严重挤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国民经济走上畸形发展的轨道。与此同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加强特务组织，进行文化“围剿”，竭力加强国民党一党专制统治，变民国为党国——变相的帝国，背历史潮流而动。至于蒋介石一时热衷于新生活运动的倡导，想要藉此重整传统道德和改造国民习俗，这对于水深火热温饱不可得的广大民众来说，实在是徒劳之举。

本书第十二、第十三两章列举大量事实记叙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与主政国民政府的汪精卫联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一再妥协退让；同时也记叙了他向联共抗日转变的过程。蒋介石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慑于日本的强大国力和军力，更忧虑国内的战乱，奉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倾力用兵于内战，而对日本大举侵略我国东北、华北，一再以退让求妥协，同意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还阻止和镇压爱国军民的抗日运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有识之士以及全国人民抗日洪流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着手调整内外政策，开始进行抵御日本侵略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张、杨兵谏和事变的和平解决，促使他停止内战，转向联共抗日。

五、八年的抗日战争，即1937年至1945年，本书第十四至十七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叙。这四章综合运用了海内外大量的档案资料，并吸取了近

些年抗日战争研究的新成果,具体记述了蒋介石顺应民心,联合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的力量,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以致举国一致,实行持久消耗、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积极部署和指挥全国军队,不惜牺牲,英勇作战,大量杀伤敌军有生力量。在日军疯狂进攻、战局愈益危急的严峻形势面前,他坚决抵制日本的诱降,并强烈反对汪精卫为首的投降势力,坚持抗战,苦撑危局,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主政国民政府,积极联合世界上反法西斯的国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以巨大的努力,废除了丧权辱国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在开罗会议上更取得了战后收复东北和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国际承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成为四大国之一,是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浴血奋战创造的光辉业绩。蒋介石作为全国抗日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国民政府首领,其历史功绩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篇章。然而他在八年抗战中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逐渐变联共抗日为防共限共,制造摩擦,无视人民群众的民主宪政要求;对日军的扩大侵略,为保存实力而消极避战,战略战术失误频仍,使国家和人民蒙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其过错也是严重的。本书对此亦给予应有的评析。

对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时期来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在政治上相当敏感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峡两岸刊布了大量的档案史料,党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逐渐淡化,研究在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理智地回顾这段历史。当然,见仁见智,程度不同的各种认识和评析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本书对蒋介石的记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欢迎读者和方家指教。

六、全面内战时期,即1946年至1949年,本书第十八至二十章作了记述。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陷入了极大的主观盲目性,一意图谋建立一个独裁专制的政府。他完全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建设的愿望,拒绝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的建议,依仗手中握有几百万军队以及美国的支持,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把苦难的中国人民又推入了战祸之中。他不断调集几十万、上百万国民党军队,用美国提供的枪炮,进攻解放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硝烟弥漫,炮火连天。他进一步推行专制独裁政策,镇压民众的反抗,取缔民主党派,强化专制统治,掠夺人民财富,给